

# 批判皮高品先生和徐家麟先生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

——記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教學中的拔白旗、插紅旗的鬥爭——

武大圖書館學系通訊小組

自從“雙反”運動以來，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和全國各個地方一樣，經歷着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系師生在校黨的領導下，大破資產階級教學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大立無產階級教學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這場兩條教學路線的鬥爭中，全系師生拔掉了系里的白旗，插上了紅旗。

## 矛盾揭開了

“雙反”運動開始後，全系師生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教學大檢查。數以千計的大字報、豐富多采的教學展覽會把我系長期存在着的問題和矛盾揭開了。我系的主要問題是資產階級的教學思想和教學路線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教學思想和教學路線極為薄弱，或者說還沒有真正的樹立起來。舊教學體系的特點，在於教學脫離實際，即脫離當前的形勢；脫離圖書館工作的實際和脫離同學的實際。這種脫離實際的傾向在教學中的表現就是厚古薄今、重外輕中、盲目崇拜資本主義國家的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輕視社會主義國家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系里許多講義不是“古文選”，便是“洋八股”。更嚴重的是有些教師的講義是整章整節的抄襲拼湊而成，自己竟成為一個“抄書公”。許多教師利用社會主義的課堂宣揚唯心主義、宣揚資本主義國家反動的圖書館學理論。在教學思想上明目張膽地輕視工農學生，打着“願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招牌，主張資產階級天才教育，實質上反對在招生、教學中貫徹階級路線。

許多教師對學生漠不關心，他們不做業務輔導工作，整天盤算着自己的名譽地位，為了個人的名利而鉤心斗角。例如系主任和教研組主任之間，不是互存戒心，便是老死不相往來。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教學質量十分低劣。

在學生方面，個人主義和脫離實際的傾向也非常嚴重，他們欣賞所謂省市以上圖書館館員的培養目標，不願作一個能上能下的普通圖書館員，害怕

畢業後下基層圖書館工作，更嚴重的是，有很多學生由於個人主義的滋長，同時也由於教學質量的低劣，認為圖書館事業“小有前途”或“沒有前途”，以為圖書館學沒有什麼值得可學，說報考圖書館學系是自己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因而要求轉學轉系的大有其人。也有的人無可奈何地勉強學下去，然而卻一心在“搞副業”，幻想一旦搞副業有了成就，自己就可以擺脫圖書館界。據統計，全系一百五十多個學生，鬧專業思想的竟占80%以上！

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表明，過去武大圖書館學系教學上掛的旗子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白旗。

## 堅決拔掉白旗。

全系師生在校黨的領導下，開始向資產階級教學路線的白旗圍攻，比較集中地批判了圖書館學教研組主任皮高品先生和系主任徐家麟先生的資產階級思想，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皮高品先生在教學上反對理論結合實際，反對到圖書館去種試驗田，他說什麼“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所以看書就是聯系實際”。他說他研究圖書館學，不是為了解決某個圖書館的具體問題，而是面向全國，解決全國性的問題。他是怎樣“面向全國，解決全國性的問題”的呢？他一天到晚坐在自己的小房間里閉門造車，從不到武漢任何圖書館去了解情況，甚至連本校的圖書館也不去。他所教的二門課程——“中國圖書史”和“圖書分類法”充分地表明皮先生的厚古薄今和對資本主義的崇拜。

皮先生的厚古薄今是系里最嚴重的。“中國圖書史”講義70%以上的篇幅用來敘述五四以前的書史，而現代的書史，特別是解放後的部分，却寥寥無幾。他在敘述現代部分時浮光掠影，而在講古代部分時則引經據典，光是引文就占1/3左右。因此同學都把圖書史講義稱為“古文選”。皮先生為了說明倉頡造字的問題，引了荀子，又引了韓非子；引

了淮南子，又引了說文解字。而解放后党帮助少数民族創造文字的偉大創举却一字不提。他为了說明我国活版鉛印圖書都是外人編印的，对“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选撮要”、“天下新聞”、“东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等書刊詳加考証。解放后出版事业迅速發展的情况和出版工作的政策、方針、重大措施，皮先生几乎都沒有提到。他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政策时，仅仅引用政务院1952年8月公布的“管理書刊出版业、印刷业、發行业暫行条例”第（八）、（九）、（十）三条，以至片面地把党的出版政策說成是消极的“管理”的条例。

皮高品先生对于資本主义的分類法迷恋不舍，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分類法則極力否定，他在講課中对于以馬列主义理論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态度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百般地加以挑剔、貶低和否定，甚至不惜虚构理由加以責难，因而得出“我們对人大法的評價是不高的”的結論。而他們对于杜威分類法則采取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的态度，竭力吹嘘杜威分類法的“技术”。更可注意的是，皮先生一直到現在还在为他的杜威分類法的翻版——皮氏分類法吹嘘，說什么“皮氏分類法是进步著作”。然而人們只要打开皮氏分類法一看，便不难看出皮氏分類法的實質了。他把国民党党义定为特藏部，冠于分類法的首要部分。他将祖國的領土台灣称为福摩薩列入日本的屬地；他把馬克思主义貶低为經濟类中的一个小类目；他把布尔什維主义称为赤化主义；把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認為他們都是社会主义的不同派別。这些例子难道不足以說明皮氏分類法的反动實質嗎？

系主任徐家麟先生在教學上更是坚持資產階級路綫的，他一貫地崇拜欧美，頌古非今，生搬硬套，食而不化。

他的教材几乎全部是抄襲过来的，而且不像一般抄襲者那样东拼西凑、偷偷摸摸地抄，而是整篇文章、整本書一字不掉地搬进了課堂。例如他上学期教的历史書籍目录学課程，就是完全把張舜徽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紹”一書从头到尾在課堂上唸了一遍，連章节次序也沒有更动一字。專科目录学序論更为可笑，这个序論不是說明專科目录学的内容概况、目的任务、学习方法，而是四篇不相干的文章的彙編，这些文章与專科目录学风馬牛不相及。例

如他在專科目录学的結論里竟大談起“冒号分類法”（印度圖書館学家阮岡納賢著，詳見中国科学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11期介紹文字——編者）来了。这种生搬硬套严重地脫离了同学的水平。

他所教的历史書籍目录学所表現的厚古薄今是極其严重的。本来教研組決定該門課程由古代一直講到現代，同时还要着重講目前历史学界所爭論的几个問題的資料問題，可是徐先生只从甲骨文講起，講到清代章學誠就不講了，擅自把近代和現代部分刪掉。他說：“自章學誠之后，中国便沒有值得一提的历史書籍和目录了”，“解放后的目录編得都不好，質量都不高，沒有搜集整理的必要”。他的厚古薄今还表現在对古的史書盲目地崇拜，严重地离开了馬列主义立場观点。例如他在評價清政府纂修的明史时，仅仅写了“体例謹严，文笔雅正”八个字，似乎它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历史著作。而“明史”的反动内容徐先生一字不提。

他在社会主义的講堂上宣揚美国的“文明”，宣揚美国資產階級反动的分類法理論，向同学灌輸“傳統的分類法慘敗了”、“必須用机械化的工具来拯救分類法的危机”、“分類法是人們为了方便而訂出来的”等等实用主义分類法理論。他为了装装門面，也言不由衷地講些所謂对資產階級理論的批判，可是加些大帽子就算完事了。

### 建立社会主义的教學体系

我們大破了旧的資本主义教學体系，我們还要大立新的社会主义教學体系。

在党的领导下，一个嶄新的圖書館学系三年跃进规划制定了。在这个规划里，提出了一个嶄新的社会主义的教學体系。

这个教學体系經過了深入的論討，終於基本上确定了。

这个新的教學体系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密切注意到目前国内工农业大跃进和广大工农羣众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对于圖書館事业所提出的要求。重新制定了新的培养目标。这个培养目标規定本科学生在“业务上能掌握本专业的基礎知識，具有一定的羣众工作經驗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胜任大、中、小各类型圖書館工作，成为能上能下的，能大能小的专业干部”。新的体系規定增設“农村圖書館”、“工矿企业圖書館”、“工农业知

識”等課程。規定圖書館學引論專門來闡述圖書館在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務。新的體系強調了讀者工作的重要性，規定“讀書指導”作為重點課之一。同時這個體系也貫徹了“厚今薄古”和“古為今用”的方針，停開“圖書史”課程，增設“古籍處理”（選修）。並且大大加強了實習的比重，每一學期都規定有3—4周集中實習時間。規定今

後的學年論文必須結合生產實習中所發現的問題來寫作。

為適應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的需要，根據多快好省的精神，學制由原來的四年制改成三年制。

目前，全系師生正熱烈討論如何具體地貫徹新的教學體系，着手準備編寫新的教學大綱和教材。（陳光祚執筆）

## 苦戰四十天，向科學研究大躍進

——記北大圖書館學系暑假科學研究工作——

史永元

自北大黨委提出利用暑假“苦戰四十天，向科學研究大躍進”的號召後，圖書館學系師生立即投入戰鬥。截止九月三日，完成了的研究項目計有：調查北京地區各種類型圖書館122個，寫出調查報告58篇；幫助海淀区巴溝村建立農村圖書館；為海淀区圖書館編寫農村圖書館員函授班教材；寫出批判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目錄學論文8篇；專題論文4篇；編寫四門課的教材：圖書館學基礎、圖書館藏書與目錄、圖書館工作組織、專科目錄學；專著一本，即“新中國圖書館事業史”。

全系參加科學研究活動的只有90多人，而時間平均每入只有25天。能取得這樣大的成就，與以前簡直是不能相比的。

這次科學研究，不論是在研究方向上、內容上或學術的觀點上，都激烈地展開了兩條道路的鬥爭。黨支部在黨委的領導下，一直掌握並堅持着正確的方向，因此，全系取得了思想、科研雙丰收。

當黨委提出向科學研究大躍進時，在學生中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思想和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兩種思想是：（1）準備在科學研究上大搞一番；（2）自卑感，認為科學研究大躍進理科能搞，文科難搞，圖書館學系更不能搞；高年級能搞，一、二年級不能搞。兩種方法是：（1）集體搞；（2）個人單干。黨支部針對這種情況，緊緊抓住政治掛帥、走羣眾路線的作法。一面開干部會、班會、小組會進行務虛，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一面發動組織在校師生進行集

體研究。結果，在務虛中消除了圖書館學不能搞科學研究的看法和一、二年級同學不能搞科學研究的自卑感。但是仍有個別人願意單干。

研究什麼呢？題目很多，每人都提了自己的專題，大大小小不下幾十個。黨支部就抓住又破又立、理論聯繫實際二條：破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立社會主義的圖書館學，總結圖書館事業的成就。於是就組織了四個批判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目錄學小組，批判的對象就是系里的劉國鈞先生和右派分子王重民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另外，畢業班同學在實習中還批判了杜定友先生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七個調查北京地區各種類型圖書館在大躍進中先進事蹟的小組；一個總結新中國圖書館事業史小組。

在批判與調查過程中，有人又產生信心不足現象，認為搞不出什麼名堂來，批判與調查的本錢貧乏。黨、團組織就及時抓思想工作，鼓舞鬥志，不斷務虛，開現場會議，表揚先進，交流經驗，肯定成績，這樣就大大鼓舞了同學們。終於在十天的時間內寫出了批判論文4篇、調查報告58篇，並調查了122個圖書館。而那些個單干的人，卻一事無成。這種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在科學研究上只有政治掛帥、走羣眾路線、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才能真正取得成就。這事實狠狠地打擊了個人主義者。

編寫教材也是科學研究大躍進中的艱巨任務之一。主要力量是學生與年青教員。過去要求學生編寫教材是不可設想的事，而且這些課程有很多是新的、還沒有學的。困難是有的，但困難阻擋不住毛澤東時代的青年。